

中國歷代思想家〔二十五〕

更新版

主編者：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沈清松 李杜 蔡仁厚 著

馮友蘭・方東美
唐君毅・牟宗三

馮友蘭·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 / 沈清松，
李杜，蔡仁厚著，——更新版，——臺北市：臺
灣商務，1999[民88]

面：公分，——(中國歷代思想家：25)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05-1621-6 (平裝)

1. 哲學—中國—傳記

120.99

88012449

中國歷代思想家(五)

馮友蘭 方東美 唐君毅 牟宗三

定價新臺幣二四〇元

主編者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
王壽南

著作者 沈清松 李杜 蔡仁厚

責任編輯 雷成敏

封面設計 張士勇

內頁繪圖 黃碧珍

校對者 羅名珍 江勝月 李蓉君

印出
刷版
所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〇二)二二三一一六一八

傳真：(〇二)二二三七一〇二七四

郵政劃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九九三號

登記證

• 一九七八年六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一九九九年十月更新版第二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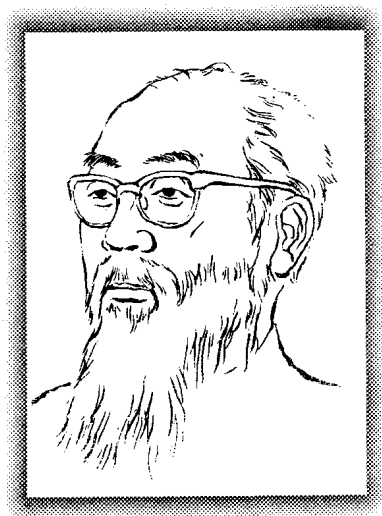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1621-6 (平裝)

34405000

馮友蘭

沈清松 著



目次

一、生平與著述	005
二、馮友蘭的思想概述	022
1 馮友蘭的中西融合方向	022
2 馮友蘭思想的分期	024
3 「新理學」的思想體系	027
三、結論	031
參考書目	034

馮友蘭

一、生平與著述

馮友蘭，字芝生，一八九五年生於河南省唐河縣祁儀鎮。其父於前清光緒戊戌（西元一八九八年）年賜同進士出身，曾任崇陽縣知縣，著有《復齋遺集》七卷；其伯父、叔父亦皆為前清秀才。馮友蘭六歲入家塾，先讀《三字經》，再讀《論》、《孟》，最後讀《學》、《庸》。其後，隨父親至武昌，繼續讀《周易》、《左傳》、《禮記》。一九〇七年，隨父赴任湖北崇陽縣知縣，跟隨教讀師爺讀《桐城吳氏古文讀本》，閒來翻看乃父簽押房中書刊，尤其愛讀其中《外交報》，因此略知世界知識和國際情況。

次年，父因腦溢血去世，隨其母吳太夫人返回唐河，繼續以家教方式學習，讀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直至一九一一年年初，馮友蘭十六歲，考取中州公學中學班，次年轉武昌中華學校。是年冬，由河南省選派二十名學生至上海中國公學就讀，馮友蘭亦被選上，於是轉赴上海。在上海中國公學，因為對邏輯感到興趣，遂萌志要學習哲學。馮友蘭在《三松堂自

序《中說》：

我有一門課程是邏輯，所用的課本，是耶芳斯的邏輯要義。先來了一位先生，他公開地把這本書當一本英文讀本來教。……後來又換了一位先生。他倒是有意要講點邏輯，可是他實在不懂甚麼是邏輯。我當時對邏輯很有興趣，就自己學習。這本書的後面有很多練習題，我就自己做練習。有一道題，實在做不下來了，我就去問這位先生。他想了一會兒說，「等下一次告訴你」。可是，他以後就不來了。當時在中國，稍微懂得一點邏輯的人實在是很少有。我學邏輯，雖然僅僅是一個開始，但是這個開始引起了我學哲學的興趣。我決心以後要學哲學。對於邏輯的興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別想學西方哲學。

一九一五年下半年，馮氏畢業於中國公學，自上海考上北京大學。原報考法科，入學後轉入文科哲學門。此一事件也顯示馮友蘭所持理想雖然堅定，但在現實上也會趨向妥協。因為他本來就立意要讀文科，但是在上海北京大學招考辦事處報名時，辦事員告訴他，「你還是先報考法科。如果你還是要上文科，由法科改文科，那是沒有不准的。如果你現在就報文科，將來你再想改到法科，那就非常困難了，你會後悔莫及的」。馮友蘭於是就聽了他的話，報考法科，等到九月入學時，再申請改入文科。結果是一樣的，但面對不同的意見，他還是做了妥協。

然而，馮友蘭雖入了文科，並沒有達到原先要學習西洋哲學的目的。因為當時北大哲學系按照章程雖有「中國哲學門」、「西洋哲學門」、「印度哲學門」三個學門，實際上，

「印度哲學門」尚未開辦，「西洋哲學門」雖定於當年開始，但當時師資只有一位周慕西教授，且不久去世，為此馮氏只好就讀「中國哲學門」。在老師中，有章士釗、胡適、梁漱溟……等人。

一九一八年三月，馮氏與黃建中、孫本文、陳鐘凡、嵇明等人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哲學會，以「商榷東西諸家哲學，瀾啓新知爲宗旨」。會址設在二道橋哲學門研究所內。四日晚七時在理科第七教室出席成立會，討論哲學會簡章，到會二十人。

一九一八年六月底，馮氏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同時，任載坤女士亦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校，兩人一齊返回河南開封，並於當年夏天結婚。自九月起，馮友蘭擔任河南第一工業學校語文、修身教員。其後並與嵇明、韓席卿等人合辦《心聲雜誌》。

一九一九年六月，馮氏赴北京參加教育部選派留美學生考試的複試，並爲留美選校事宜去拜訪胡適，胡適告之以「美國的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都是有名的，但是哈佛的哲學是舊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是新的」。於是決心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研究。同年十二月，搭乘中國郵船公司「南京號」海輪由上海出發抵紐約，先從法伯（Farber）先生學習一段時間英文之後，於次年一月二十二日辦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入學手續，開始研究西洋哲學。對於由北大到哥大的心志，他在自述中有所說明：

我覺得在北大的三年收穫很大。這三年可以分爲兩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我開始知道，在八股文、試帖詩和策論之外，還有真正的學問，這就像是進入了一個新天地。在第

二個階段，我開始知道，於那個新天地之外，還有一個更新的天地。……這兩個天地是有矛盾的。這是兩種文化的矛盾。這個矛盾貫穿於中國歷史的近代和現代。……從一九一九年我考上了公費留學，於同年冬到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系當研究生。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也可以說是帶著中國的實際去的。當時我想，現在有了繼續學哲學的機會，要著重哲學上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我的哲學活動的開始。

於是馮友蘭打算在哥大潛心研讀西洋哲學，並留意中西比較問題。初抵紐約時，研讀英文哲學史關於柏拉圖理型（idea）與質料（matter）之說，便覺得其頗似真如與無明，因謂「人之思想，絕對相類」。在一九二〇年二月七、八兩日的日記中，馮氏更取西洋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相互比較，而列表如下：

經院哲學	
第一期以宗教、哲學為一事……	三國六朝
第二期漸攻宗教而唱哲學獨立……	唐五代宋初
近代哲學	
培根	程朱派
笛卡爾	陸王派
近代科學	清儒考據
希臘哲學最盛時代	戰國哲學最盛時代
懷疑派推翻哲學	秦皇焚書使世無哲學，漢儒咬文嚼字使世厭哲學
耶教興	佛道二教興

以上的比較雖然仍十分表面，但已可以看出馮友蘭在此時期所關心的問題，也就是要著重在哲學上解決中西文化的問題。一九二〇年冬，寫成“Why China has no Sci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the Conseque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爲甚麼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後果的一種解釋〉），並於一九二一年秋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學會中宣讀該文，其後該文刊於芝加哥出版的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 《國際倫理學雜誌》三十二卷三期（一九八三年由涂又光譯成中文，收入《中國哲學史補》）。該文認爲中國哲學有三大學派，道家主張自然，墨家主張人爲，儒家主張中道。但墨家失敗，人爲路線消亡，從此中國思想注重人倫日用，只在內心尋求善與幸福，此即中國沒有科學的原因。此文中所提出的思想其後又繼續在博士論文中加以發揮。

一九二三年暑期，馮友蘭完成其博士論文“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天人損益論〉），並通過答辯，隨即經加拿大搭船返國。暑期過後，立即擔任中州大學教授兼哲學系主任與文科主任（即後來文學院院長）。按哥大規定，博士論文須正式出版，始能獲正式文憑，於是馮氏將博士論文改名“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於一九二四年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出版後便獲哥大哲學博士學位文憑。同年，由劉積學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並被選爲河南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一九二五年九月，馮氏見報載教育部將設國立編譯館，爲此曾致函胡適，請代爲在教育部國立編譯館謀一職，以方便研究，然未果，便轉赴廣東，一方面應友人陳中凡之邀，一方

面亦想看看革命發源地，乃赴任廣東大學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一學期。之後，由於見到廣東亂局與香港大罷工，乃離開廣東，轉赴北京，於一九二六年二月起，擔任燕京大學哲學教授兼研究所導師，講中國哲學史；又兼北大講師，講西洋哲學史；並在東單四條五號華語學校講《莊子》，並譯《莊子》內篇以為講義。其間曾中譯《赫拉頤利圖斯殘句》刊於《文藝》一卷二期，並將“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改寫為中文版，加改寫之〈一種人生觀〉為最後兩章，以《人生哲學》為名，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此後，馮氏亦經常發表各類文章，校閱譯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於一九二七年六月於初創刊之《燕京學報》發表的〈中國哲學中之神秘主義〉一文。該文認為佛家哲學是神秘主義，但嚴格說佛學不是中國哲學。中國哲學以道儒兩家為主，而兩家「皆以神秘底境界為最高境界，以神秘經驗為個人修養之最高成就」。

一九二八年八月，國民政府改清華學校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羅家倫為校長。羅邀馮友蘭至清華，擔任哲學系教授兼校秘書長，直到次年二月，因同時教中國哲學史、知識論、倫理學，授課時數增加，辭校秘書長職，專任教授，並於九月起，擔任清華哲學系主任。後來在回憶中，馮氏曾寫道：

我在燕京兩年多，在講課這方面，我開始寫兩卷本《中國哲學史》。……羅家倫聘請楊振聲為教務長，我為哲學系教授兼秘書長。……使我滿意的是，這是個中國人辦的學校，可以作為我的安身立命之地，值得我為之「獻身」，所以就呆下去，一呆就呆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才被調整到北大。

在這段期間，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了《中國哲學史》的寫作。該書上卷於一九二九年寫畢，先分贈師友徵求意見，其後，再於一九三二年二月，作為清華大學叢書之一，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是年英譯《莊子內篇》（*Chuang Tzu*）於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哲學史》下卷於一九三三年六月寫畢。馮氏作〈自序〉一篇，曰：

此書第一篇出版後，胡適之先生以為書中之主要觀點係正統派的。今此書第二篇繼續出版，其中之主要觀點尤為正統派的。此不待別人之言，吾已自覺之。然吾之觀點之為正統派的，乃係用批判的態度以得之者。……此第二篇稿最後校改時，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處其境，乃真知古人銅駝荆棘之語之悲也。值此存亡絕續之交，吾人重思先哲之思想，其感覺當如人疾痛時之見父母也。吾先哲之思想，有不必無錯誤者，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乃吾一切先哲著書立說之宗旨。無論其派別為何，而其言之字裏行間，皆有此精神之彌漫，則善讀者可覺而知也。「魂兮歸來哀江南」，此書能為巫陽之下招歟？是所望也。

自一九三三年八月起，馮氏休假一年，應邀赴歐講學，於九月十二日搭義大利郵輪 Conte Verdi 號由上海出發，於十月五日抵義大利，乘火車沿途遊歷龐培、那不勒斯、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米蘭等地，於十一月底經巴黎抵倫敦，住於大英博物館附近。此時乃依據《中國哲學史》寫成講稿十篇，先後往倫敦、劍橋、牛津、利物浦、曼徹斯特、伯明漢、格拉斯哥、愛丁堡等大學講學，並曾寄講稿給羅素，羅素復函表示歡迎來英向英人介紹中華文

化。此外，並曾拜訪維根斯坦，與之漫談哲學問題。期間，亦曾在大英博物館讀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並受其歷史唯物論影響。後來他在《新理學》底自我檢討中表示，「一直到解放前，我一直相信我可以在歷史研究方面持唯物論，而在本體論方面不必持唯物論」。

馮友蘭在英國講學完畢，乃離英往遊歐洲各大國，又經波蘭至蘇聯，再離蘇赴布拉格出席第八屆國際哲學會議，在會中發表“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哲學在當代中國〉）一文，文中表示，「對於中國的與歐洲的哲學觀念在作比較和研究，沒有任何意圖去斷定哪個一定正確，哪個一定錯誤，只不過懷有興趣要弄清一種觀念用另一種觀念講是甚麼。希望不久以後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哲學觀念得到中國哲學直覺和體驗的補充，中國哲學得到邏輯和清晰思想的澄清」。

馮友蘭於會後由威尼斯搭義大利海輪返國，於十月上旬回到北平，繼續擔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及哲學系系主任。約同時，《中國哲學史》上下冊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作為大學叢書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國哲學史補》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收到兩年來所撰《原儒墨》、《原儒墨補》、《原名法陰陽道德》，馮氏認為「此三篇合而觀之，成為一先秦子學諸家起源考，可補拙著《中國哲學史》之不足，並正其錯誤」。

及抗戰軍興，清華校園漸亂。一九三七年九月，清華大學決定南遷，先是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合併為「長沙臨時大學」。馮友蘭遂南下，度一艱困之戰時教學與研究生涯。十月，遷南岳。次年一月，寫成《新理學》一書，馮氏在該書自序中表示：

數年來即擬寫《新理學》一書，因雜事多未果。去年中日戰起，隨學校南來，居於南岳，所見勝跡，多與哲學史有關者。懷昔賢之高風，對當世之巨變，心中感發，不能自已。又以山居，除授課外無雜事，每日皆寫數千字。積二月餘力，遂成此書。數年積思，得有寄托，亦一快也。

四月，由於京滬失守，武漢震動，長沙臨時大學乃轉遷昆明，改名「西南聯合大學」，馮氏在昆明繼續修改《新理學》稿，先交蒙自一石印館石印，分贈師友，並進而開始逐篇撰《新事論》、《新世訓》、《新原道》、《新知言》、《新原人》，以上合稱《貞元六書》。《新理學》至一九三九年五月始由商務印書館在長沙正式出版。《新事論》於次年五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七月，《新世訓》由上海開明出版社出版。一九四五年，《新原道》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次年底，《新知言》、《新原人》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

一九四三年秋，馮氏在蔣夢麟家出席聯大國民黨員教授會議，會中公推馮氏起草致函蔣委員長，敦促其及早立憲。信中曰，「睹一葉之飄零，知深秋之將至，……昔清室遲遲不肯實行憲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黨得以成功。前事不遠，可爲殷鑑」。爲此乃敦促實行憲政，以收拾人心。一九四五年初，母喪，與乃弟景蘭歷萬難返鄉奔喪，寫《祭母文》，文曰，「維人傑之挺生，皆造化之鍾靈，但多傷於偏至，鮮能合乎中行。……惟吾母之懿質，集諸德之大成。八十年之人生，信始終之全完。備洪範之五福，宜無憾於人間」。馮氏後來在一九六六年自我檢討的《我的反動歷史和社會關係》中表示，上述給蔣委員長的信函與《祭母文》

二篇是他的「忠孝大文」。

西南聯大時期，馮氏曾多次在重慶爲國民黨中央訓練團演講「中國固有哲學」。亦曾於一九四五年五月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此可見，直至此時，馮氏政黨的隸屬還是國民黨。

隨後戰局急轉直下，日本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投降，抗戰結束，西南聯合大學於次年夏天告終，各校遷返北京。一九四六年夏，馮氏於返回北京後，八月上旬在建國東堂爲第十一戰區政治部主辦之學術講座，演講〈中國哲學與民主政治〉，聽眾千餘人。馮在演講中表示，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有四：第一、要有人是人的感覺，人有獨立人格，自由意志，彼此平等，不以任何人爲工具；第二、對一切事物都有多元論的看法；第三、要有超越感，彼此互忍相讓；第四、要有幽默感，凡事成功不易，不成功就「一笑了之」。此外，他並認爲孟子說「人皆可爲堯舜」、「堯舜與人同爾」，是最平等的思想；儒家不但不反對異，而且主張必須有異。他說，「中國哲學家實在具有此等（以上四種）見解和態度，對於民主政治的實行，的確是相合的」。

一九四六年底，馮氏應邀赴美賓夕凡尼亞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講中國哲學史。出國後，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曾電請馮氏前往登記，但由於馮氏已出國，其夫人並未代爲前往登記。次年四月，馮氏獲頒普林斯頓大學名譽博士學位。當年秋冬，赴任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仍講中國哲學史。如此一再講述，自己也覺得成了博物館裏的陳列品了，心裏很不是滋味，心想還是要先把自己的國家搞好。於是，在結束夏大講學後，於一九四八年三月返國，於清華重

開講席。時國共內鬥激烈，時局緊張，瀕臨崩潰，能走者紛紛走避共產黨。年底，校長梅貽琦於校務會議之後與馮氏話別。梅氏走後，馮友蘭被校務會議推為校務會議臨時主席。馮氏後來在自我檢討發言稿〈自我揭發·自我批判〉中表示，「我之所以在解放時沒有走，主要是由於對國民黨反動派的失望，並不是由於對共產黨的歡迎」。

一九四九年，大陸變色，中共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馮氏主持校務會議，至當年五月，清華成立校務委員會，馮仍任校委會委員、文學院院長、哲學系主任，至中共統治略上軌道，馮氏因為被認為思想與共產黨不合，乃於八月三十一日以「能力不勝」為由，請辭三項職務，卻被告知應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動言行，直至九月下旬，才以自己曾兩次參加國民黨，其間言行錯誤甚多為由，辭去一切兼職，只擔任哲學教授，此時馮氏頓然有「無官一身輕」之感。彼時雖已在中共統治之下，但仍不自知，認為自己的學術地位仍被重視，其實，中共已多次要求其認真檢討過去，改造思想。爾後檢討，馮氏認為自己當時有兩點反動思想：

(1) 我認為，我是中國人，人民政府是中國政府，我當然服從，但我不是共產黨，黨與我沒有直接關係。

(2) 我既然服從人民政府，當然跟臺灣斷絕關係，但是不罵臺灣。「君子絕交，不出惡言。」我認為《禮記》這兩句話很有道理。

不過，為了表態，他仍在當年十月五日致函毛澤東，表示過去講的是封建哲學，幫了國民黨的忙，從今以後，決心改造思想，學習馬克思主義，準備在五年內用馬克思主義的立